



##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学

林兴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朱水涌(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 诺(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夏 敏(集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王予霞(欧美文学翻译家)  
吴尔芬(作家)

### 中国文学面临的冲击

**林兴宅:** 我们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受到三次冲击。第一次是市场化或者叫商品化的冲击,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文学边缘化,整个中心转移了,企业家充当了社会主流角色,文学退到社会的边缘;再一个变化就是文学和商品的实现连在一起,精品文学慢慢失去社会的关注,而一些流行的、时尚的文学作品地位却在上升。第二次冲击是网络化,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所带来的变化就是个人化写作,写作越个人化,文学就越成为交际的手段,不再是社会宣传的工具、运动的工具,这个变化使文学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定位

和发展目标。现在是第三轮的冲击,就是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之后对文学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现在来探讨这个问题是比较超前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在中国刚刚开始,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如何预测这次的冲击与前面的两次冲击会有什么不同?我们来探讨,就是未雨绸缪。

**朱水涌:** 我不同意文学受到三次冲击的说法,实际上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事。网络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商品化也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是同一个范畴里的东西,并不是三次冲击。柏林墙一倒,经济全球化就迅猛异常了,二战以后形成的意识形态对抗,是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经济全球化的进程。90年代以来,

世界就不一样了,表现在文学创作,就是那些摆出一副“边缘”姿态的作家,却分明已经稳居了主流的位置,去看看那些“另类文学”的畅销情况就明白了。这些作家和作品的共同效益,就是让人放弃思考、放弃追问,使人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粗鄙化。很容易造成除了金钱和时尚,别的都没有兴趣的恶俗,所谓“单向度”的平面人。

**王予霞:** 中国现在的作家基本可以分成三类,一类贴近意识形态主流,搞主旋律;一类写历史小说,这些作品“钱程”看好,可以改编成电视剧又没有政治风险;还有就是所谓的另类写作。现在的畅销刊物,如《知音》、《女友》、《婚姻与家庭》等,读者都是定位在城市中产阶级,是为中

产阶级度身定做的；而文学刊物《收获》、《十月》、《福建文学》等很是低廉。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明显的是中产阶级话语在大众文化市场上获得成功。她们的小说出现在90年代末的大众文化市场中，与美妙缤纷的广告、奇货可居的购货中心、精美豪华的休闲杂志，构成了一幅消费主义的盛世。最近九丹的《乌鸦》，作者自己说只想把伤口给人看，丑陋的展示、商业的利润，其实与卫慧的小说同出一辙。这种小说固然可以获得暂时的利润，但其中人物的轻飘和思想穿透性的匮乏，使它们注定是昙花一现的东西。

**王 诺：**我们到底是谈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是谈纯文学而不是通俗文学。在美国，这两者是要严格区分的，大部分有成就的作家都是比较边缘、比较苦的人，写纯文学的是女人、少数民族，中产阶级、欧洲的那些人就是写畅销书的。我在美国参加过他们好多次的文学讨论会，热情非常高，朗诵诗、讨论诗，都是中产阶级，他们都不是作家，纯粹是关心文学。如果两者搅在一起，作家的心理就会不平衡。如果你是献身于人类关怀的，你就老老实实干这个，如果是想搞文化产业，那是另外一回事。把棉棉、卫慧都扯进去，那就别谈文学了。要谈就谈不求商业效应但求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有自己独创性十年磨一剑的。我看得分两次谈，文化产业或者说文学商品化单独谈一次，今天不说这个。

**夏 敏：**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实验，让每个学生按自己的喜好去复印一篇小说，只要是2001年度在国内发表的就行，要他们对自己看重的小说语言进行分析。我要求学生都把小说附在作业的后面，交上来后我花

了一周时间一篇一篇地看。看下来后我感到非常恐怖，因为每一篇学生所喜爱、所看重的小说要么是欲望写作、要么是厕所里的悄悄话、要么是床上功夫的表白。2001年度的中国文学居然是这个样子？这是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事情，我们所界定的通俗小说早就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们居然还在讨论纯文学，纯文学在哪里？难道他们占据了媒体，就等于占有话语权？有问题！

**吴尔芬：**在美国，严肃的作家是跟哲学家跟诗人并在一块的，叫文化；导演、演员、歌星是跟妓女并在一块的，叫娱乐。冯小刚说他跑到美国街头自称导演，妓女立即过来搂着他，好啊，我们是同行，同属娱乐界嘛！这让人不舒服。我要说的是，中国作家还远远没有掌握通俗小说的外部规律，连外部特征都没有学会。我们只会写自己的感觉，强调的是怪异、与众不同。我不知道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个人的感受跟读者有什么关系？把自己的迷乱表现出来，然后说这是个人化写作，是纯文学，你们会接受吗？

**王予霞：**中国将进入一个文化消费时代，生存于其中的便是现代大众文化。文学置身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所要应对的是面临着“边缘化”、“休闲化”、“另类化”的危机。消费性文学将形成新的高潮，文学的生产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行为，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商品化的生产过程。以现代媒体为手段、以社会大众为消费对象的文学将成为文坛的主角。积极的方面是消费性文学形式满足了广大公民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充分释放现代大众文学的潜在能量，使文化创造者和传播者的个人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消

极的地方就是主流文学将被虚置。

### 经济全球化，文化传统的克星？

**朱水涌：**1927年冬，鲁迅这样概括当时中国的状况，“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这大时代也就是医学上人生命的“极期”，“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用今天的语言说，也便是希望与绝望同在，机遇与挑战与危机并存。我们对加入WTO感到振奋，但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这是没办法的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实体与文化接触所呈现的一种双重现象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全球化有三个标志，一是跨国资本的运作，二是高科技，三是信息化。这就是说，借助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最重要驱动力——跨国资本和高科技一体，经济和军事的强势一方也会形成对经济和军事弱势一方的文化霸权，这是不可否认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亨廷顿曾经将全球化看做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还提出21世纪的矛盾就是民族文化的矛盾。

**林兴宅：**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一是文学已经边缘化。我们一个文化官员最近的提法，“文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至高点”，是很有道理的。我可以再补充一点，文学是文化的精品，我们在讨论文学问题，实际上也是在讨论文化问题。讨论文化问题也必然要包含文学问题，这样大家涉及的面就会更广。今天的讨论我们可以表述为：“经济全球化之后的中国文学(文化)”。自从中国进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以后，

文学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美梦就结束了。文学一直处在和现实不相适应的状况,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定位和发展目标,很多文化人都在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巡察以后,中国进入了市场化改革的时代,这个矛盾就格外地突出了。我们的文学一直处在和现实生活适应、调整,再适应、再调整这样的循环之中,所以,要重新评价,这里就有文学定位和发展目标的问题。

**王 诺:** 尽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劈头盖脸地打来,但我们所面对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依然是那么复杂、那么纷繁。人们常常感到,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和选择。在这样一种既有全球化又有多元化的态势里,只强调地方性、民族性、特殊性是无济于事的;只站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立场上去向世界提出要求或抗议,只能把这个世界弄得更乱。多元化、地方化、美国的单边主义、相对主义的招牌,既可以是怯懦的挡箭牌,也可以是强权的遮蔽物。特定的民族、特定的传统和特定的文明固然重要,不需要论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达成共识。找出能为各方接受的、具有普适价值的价值,这才是目的。更为重要的是,继承和弘扬那些具有普适价值的、整个人类都迫切需要的传统文化成就,而不是搞独特的。就像我们厦大,抓特区定位、面向台湾,跟人家一比就不行了,基础学科上不去,抓一点特色怎么行?

**王子霞:** 文化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的文化向我们扩张过来,这是谁都看得见的。本土的东西一下就被摧毁了?那也不可能。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

门,但英国文化并没有在我们中国扎下根。我们接受外来文化不会那么迅速,总是有一个碰撞的过程,那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就是普适性的东西。

**吴尔芬:** 中国文化的局限是明显的,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就是入世与逍遥。儒家是入世的,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官场一受挫立即就转入道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者琴棋书画诗花酒色。现在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既不能入世又不能逍遥,一逍遥就要钱。那么他们的精神面貌是什么呢?他们就会处于一种孤儿的状态,孤儿是自由的,但他要忍受流离失所的痛苦。经济全球化之后,普通中国人也将获得一个精神孤儿的地位。比如说客家人是祭祖不祭神,家家户户挂祖宗像,他们把祠堂看得重于一切,他们的精神表现是祠堂和族谱。请问在众姓混居的城市小区,他们到哪里去寻找祠堂和族谱呢?因此他们获得了一个孤儿的地位。跟我住在同一个生活区的老乡说,整个人无所适从,卖猪肉赚到钱后干什么呢,喝点小酒,生活没有价值没有意义。还有,中国文化其实是个穷文化,我们有很多古训告诉我们如何容忍贫穷,什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什么独善其身知足常乐,但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富起来以后要干什么。现在的人就算他赚到钱又干什么呢?还得贴到他原来的文化背景上,修坟墓,讨小老婆,生几个儿子,把族谱印一印,把祠堂翻修一下,不然叫他干什么?不解决个人信仰问题,城市化就是空谈。意识到这种精神困境的作家是不多的,意识到当代人孤儿地位的人更少。

**夏 敏:** 经济是走得最快的,人首先要衣食住行上享受现代生活,

必然会带来生活方式、伦理观念的认同危机。我是谁？跨国婚姻导致自己不懂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以前觉得西方是洪水猛兽，但今天并没有引起什么恐慌，只有学者作为文化关切会去想到这一点。中国加入WTO之后文化市场也不是太紧张，人们通过改革开放二十年已经适应了。东西方文学彼此还是能够拉起手的，但是你是你我是我，可以保持“和而不同”。

**朱水涌：**目前，西方世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西方文化应当是全世界的文化。这种观点的自负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西方通俗文化正在席卷全世界，二是认为西方在引导全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实现西方化。这两种观点的历史现实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延伸和扩张。因此，文化霸权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就文化全球化的表面现象或状态、情景而言，詹明信将其描述为“高速公路旁的快餐店风景”。这里包括香车美女的汽车文化，它是借助经济促销把文化带进来。高速公路景观及郊区住宅的兴起、旅游业的兴盛、以麦当劳为标识和象征的快餐文化的极盛，都包含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悄然转变。用跨国资本连锁运作的成功实现文化扩张，不仅改写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生活趣味，而且提供了一种经济与文化联手扩张的成功范本。就文学艺术领域而言，是以平装本畅销小说和好莱坞电影所象征的大众文化的全方位兴起。好莱坞在中国仅仅从10部进口的限数变为20部，尽管只有六年时间，仍然几乎击溃原有庞大的中国本土电影工业。其范本特征，便是它充分的消费、娱乐的功能，再做出一些充满诱惑的人性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称其

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心灵统治术、社会水泥。

### 普适性，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

**王 诺：**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一下。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精神需要一些东西来冲击，到底需要什么？全球化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契机。我在哈佛参加过两次全球化的论坛，也发过一次言。我认为，全球化给中国作家的影响就是要我们更加关注具有普适性的价值。朱老师说得对，经济全球化下面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更重要和更深层次的是观念的全球化，是具有普适性的价值为整个人类所关注所重视的趋势。例如公平竞争、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公正和正义原则、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对弱势群体和弱小民族的同情与帮助、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人的尊严和权利等，都是我们民族极其需要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但我主要从积极的方面来考虑。只要人还算是有良知的动物，那么就一定有一些起码的道德和正义准则不容置疑和不能背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背弃。

**朱水涌：**这里牵涉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对立思维问题，我们现在不能再延续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保守与改革、市场与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种机械两分的思维模式了，这种思维是不可能说清楚全球化中的中国现实的。目前中国都市中的流行文化具有双重特性，既出自于全球化的文化格局，深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又深嵌在当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中，自有特别的政治、经济和性别含义。要从多样的角度去理解“全球

性”和“现代性”，以更复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把握时代的生活，帮助公众逐步获得对“人”的历史和现实丰富性的确认。

**夏 敏：**虽然有文化的全球化、观念的全球化，但是，有些东西不会因为什么化而发生太多变化。除了普适的东西之外，还有本土的特色需要全球的承认，如果全盘接受西方就会陷入殖民文化的状态当中。毕竟我们还是汉语写作，所表述的汉语背后的东西、所叙述的现代化掩藏不了骨子里的传统，比如有的作品甚至还是封建的思想。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当中，文学治疗的功能不会变化，文学具有宣泄的功能和关怀的功能，受众与作者之间有共鸣的功能，还有精神需要的功能，都是文学得以存在的前提。今天这个时代跟过去是一样的，普适的价值不会有太多变化。还有对当下生活的深切关注也不会发生太多变化，虽然作品写的是大老板的事情，是白领阶层的事情，但是白领当中所表现的东西，恰恰表明了我们目前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焦虑。对任何一个时期的人们，今天文学的炒作或浮躁也是全球化时间流当中的一部分，不需要有大师和英雄来更正它，人性当中本性的东西是一定会受欢迎的。人类的本性都是需要公平的意识，需要善良，需要真诚，不同的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我们和西方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红楼梦》在他们的眼里还不如《西游记》好看。当然，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对某个乡土创作观念形成变化，我们要承认这种事实。

**王 诺：**我认为不光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尊重生命、维护人最基本的尊严、反对以任何理由对无辜生命——我们的同类——蓄意攻击和肆意

侵犯，难道不是最起码的正义底线吗？践踏了这一正义底线，其他所有的道理和感情都变得毫无意义。中国文学要真正走向世界，首先要有全球的视野和俯瞰世界的高度，不要老是从自己的国家出发。全世界的作家都在关注什么问题，我们的作家也要作出思考，关注和表现普适性价值——无论其根源在东方还是西方、前殖民地国家还是前殖民主义国家。好的东西不能因为来自美国就不承认，不好的东西不能因为是老祖宗的就承认，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点，不然你站在你的立场我站在我的立场，永远也讨论不清楚。无论我们讨论文化冲突也好、文明对话也好，有一个基点，那就是普适价值，否则全球化就完全是洪水猛兽了。真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题材、背景和原形，一定是代表了全人类的意愿，艺术地和独创性地写出了普遍人性和恒久的普适价值的作家，这才是全球化之后的世界性作家。我们首先要全球化，如果不断地强调自己的传统，认为传统非常重要，那怎么办呢？

吴尔芬：传统的东西我们只继承有普适价值的部分，该否定的还得否定。儒家文化的骨子里就是家族文化，家族至上，所有的是非观就是家族的是非观。比如说自己的亲戚只要能当官，即使他贪污都是好亲戚，不会去管他是否有法治的精神、民主的诉求、道德的操守、专业的素质，这些通通跟我没关系，关键的问题是他是亲戚。这也是我们连一个村长都选不清楚的文化背景。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的勤俭和职业观念对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提供了一种心态的支持，而中国儒家和印度宗教都不能提供类似的这样一种心态，这是亚洲资本主义未能自发产生的重要原因。一

个明显的事实是，以忏悔和认罪为核心的基督教传到中国后便披上了浓重的中国式功利色彩，变成求财求子求平安。

#### 文化全球化的文学困境

夏 敏：全球化带来对本土化的冲击，但我们并不会在这种强势之中丧失自我，我们也希望在全球化当中把自己的东西拿到世界上去。强势是主流，弱势也不甘寂寞。写作行为本身，从观念上讲是可以全球化的。但是，汉语或其他语言都有不可译性，普希金诗歌的那种神韵就无法翻译，庞德也试图把中国的唐诗翻译过去，但神韵没有办法译。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鸿沟是文化传统带来的，但不能认为有鸿沟就不能弥合，照样可以按照内在的规律运行。今天的很多东西已经不中不西不古不今，像金庸用传统的半文不白的语言也能站稳脚跟。

朱水涌：全球化浪潮越是迅猛，各民族越会担心丧失自己的民族性，越是会特别关注面对全球化“危险”而产生的文化家园失落，越会有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个性的强烈意识。20世纪末期，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寻根意识的高涨，“东方主义”理论的流行，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失落文化家园的恐惧、焦虑与重建家园的焦灼呼唤，实际上是对全球文化多元主义情景的一种精神呼应。全球化这个词语所标识出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欧和北美渐次形成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欧美知识界简称之为“全球化就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我们的经典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应该继续生存的原因与基础，是因为只有文学艺术才能够继续作为一处“半自律空间”存在而互动于社会。这

是精神的标志，也是文学的价值所在。中国自己的文学是会长远存在的。童庆炳先生说文学是情感的东西，情感不会灭亡，人们需要情感的表达，文学就会存在。

王予霞：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正如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所谓“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的扩张过程，借以形成西方的“文化霸权”和第三世界对西方的“文化依附”。由于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差异，文化的传播只能是单向性的，即由位居强势的西方国家流向位居弱势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现行的文化教育机制的缺陷和不适应性将更加明显，由国家直接控制、统一管理将更多转向自由竞争、市场调节。入世后，外来文化不仅会削弱本土文化，甚至还会加剧亚文化与主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使作为本民族精神支撑的主文化被虚置和抽空，以至无法按自身逻辑得以承传与发展。中国的四大名著都没有世界性的视野，没有但丁、歌德、托尔斯泰、艾略特他们的终极关怀，他们都是关注人类命运的，根源就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基督教。《圣经》里拯救全人类的普适性关怀跟儒家道家的个人修身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学会小家子气。

吴尔芬：我们的四大名著有三部是通俗小说。《西游记》是神怪小说，而且结构千篇一律。每个妖怪获得唐僧只有两个目的，嫁给他或吃他的肉，而孙悟空都是打不过的，一打不过就搬来如来或者搬来观音，还有什么招数？《水浒》就更通俗了，甚至没有是非观，凡是我哥们做的事情就是对的，不是哥们就是敌人。黑旋风劫法场时逢人就砍；武松杀光张都监全家老小，眼睛都不眨一下。《三国

演义》作为战争小说讲的是谋略，谋略更不讲是非，战胜高于一切，成者为王败者寇。然而，这三部小说恰恰表明了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面，没有爱没有是非，只有江湖义气、只有家族利益、只有功成名就。

**王 诺：**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不需要恐怖主义，我也不能对别人实施恐怖主义，冤冤相报永远没完，布什总统就是没有明白这一点。在世界的思想界里特别强调中国的这一点，这就是我们要发扬的东西，这就是能够被全人类所接受的东西。为什么巴以老是讲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不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学习？新加坡是个小地方，马来西亚包着它，新加坡要发展，都会考虑到马来西亚怎么发展，他们是一种和谐的关系。我立，我让你也立；我达，我让你也达，这样就没有什么大矛盾。而巴以之间是你甩我一个耳括子我要打掉你两颗牙，永远没完没了，美国对付恐怖分子也是这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兼利万物”等等，都是受到世界各国生态哲学家、生态伦理学家、生态文学家和未来学家的一致推崇的精神资源。在我看来，如果要发扬民族传统、要发扬优良文化，首先是要发扬那些具有普适价值的东西，而不是什么民风民俗，那只是一种写作背景。

**朱水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就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漩涡，一方面是国际资本急剧打开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是国内社会的“现代化”冲动持续不已。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步伐更迅速、更大，甚至连人民解放军这支最富中国特色的队伍，也改变原有的军帽与国际接轨。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半个身子，已

经伸进“全球化”的轨道。在这样的浪潮中，追问时代内容的公众热情已经大为涣散，“经济人”的理念却滋生出来；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这样，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知、尊严遭人冷落，人心天平向一面严重倾斜。在这样的時候，旧的权威意识形态愈加丧失对公众的影响力，或者化为若干空洞的词句，基本上退出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那么，接替它的是谁？是谁在向公众系统地描述和解释现实、历史与未来？是大众传媒、是时尚、是一些在经济大潮滚打出来的所谓“成功人士”，尤其是王晓明所说的那批“新富人”。这一切迎合和利用公众摆脱物质贫困的普遍欲望，很容易被人接受，但却回避、简化甚至遮盖了现实，而且夸张、涂饰甚至虚构了现实。文学的中国化非中国化在形式上意义是不大的，关键要能关注、察觉到当代文化、当代生活中精神和物质因素的互动关系，把握到这种关系的复杂性，用审美的感知和感受、体验的话语打破观念中的那种将精神和物质生活截然两分的普遍错觉。

**吴尔芬：**作家们都有怀旧情绪。我认为这种怀旧的情绪是虚伪的，去哪里开个笔会，回来就开始写散文，啊，那个古民居多么漂亮，让我住在那里一定会成仙。但是你会去住吗？不会，因为蚊子成堆，上厕所不方便，洗澡也没地方。有文化人问薄熙来，你说你把大连的那么多旧房子拆掉，对历史是有罪的。薄熙来说，你不要问我有罪没有罪，你去问问老百姓，他们住在旧房子是多么的不方便，是他们要拆不是我要拆。“怀旧”是文人情结的虚假。

**朱水涌：**1999年提出的汉语写

作的口号，本身是一种文学的自觉。文学是语言的东西，自觉到经济全球化中中国文学的命运，自觉到不以诺贝尔的标准作为标准。因为如果是经典的汉语文学作品是不可能翻译的，《红楼梦》能翻译吗？唐诗能翻译吗？不能翻译呀，王维的诗一翻译境界全没了。当然不是要我们回到文言文写作、用格律体，而是要承续民族那种不可替代的文学意味，在中国的审美方面，所谓一字尽得风流，那种艺术境界就包含了人的自觉。文学就是关注全球化之后人处在什么位置上，人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是文学要关注的。

#### 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展望

**林兴宅：**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一个争论，文学到底是推向市场还是反抗市场法则？把文学推向市场是发展文学的一个调整。1991年在厦门召开特区意识形态研讨会上，我在会上作一个发言，提出文学要反抗市场法则，叫《明显的导向：把文学推向市场》，后来刊登在《福建论坛》上。当时与会的领导都非常同意这个观点，现在看来我们根本无法反抗市场法则，文学无可挽回的就是要跟市场接在一起，反抗是理想化的事情，文学和商品总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朱水涌：**文学或艺术当然不拒绝市场或畅销，但为市场或畅销而度身定制的作品，却几乎不可能成为艺术，经典的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创造力、是发现，以及对发现的独特表述，是经济全球化语境中独特的表达，是良知的作家的独特的对时代、世界的理解力和想像力。就这个角度说，文学要考虑的不是它自身如何融入全球化的话语体系，而是它如何以

自己独特的敏锐性去触摸、感受这大时代的初生状态,作出艺术表达,提供给这个时代人们必须获得但又无法自觉察觉到的精神营养。

**吴尔芬:**我们对通俗、对畅销有误解,以为通俗的作品就是低劣的、就是媚俗的,而把个人化写作认为是高雅的、是纯文学的。我要说一百年之后金庸的小说一定还在、还要重版,而现在的大多数自以为是的作家的作品肯定要灰飞烟灭。其实好莱坞的电影具有通俗的外部特征并不等于没有质量,否则不可能有人的地方就有好莱坞的电影。《与狼共舞》、《教父》、《沉默的羔羊》都是好作品,揭示了人类仇恨、嫉妒最本质最阴暗的一面,但它具备了畅销作品的所有外部特征。比如影视剧的时间跨度不能太大、主角不能太多,不然演员没办法找,一定要有亮妞或帅哥做主角,这是铁一样的规律不能更改,一更改就没有收视率的。现在对通俗影视的批评非常多,但那些从业人员都不怎么理睬,为什么呢?比如一个三口之家,男主人说这个《还珠格格》乱七八糟,什么你是疯来我是傻?这个不要紧,关键是他的老婆爱看、他的女儿爱看,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老婆女儿爱看,收视率就是三分之二,如果男主人爱看她们不爱看,收视率就只有三分之一。何况男人是没空看电视剧的,他们要开会要赴宴,所有的男人都有很多事情要做。只有家庭妇女洗完碗之后她要看一集电视剧。电视剧就是生产给这些人看的,至于专家文化人怎么批评大可不必理他,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因为没法改,一改就没有效益。这就是文化产业的规律,不容抹杀。

**王 诺:**全球化要使我们中国人高度树立一种意识,否则对中国人

还是没有根本的触动。那就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消耗和濒临枯竭,可以毁灭世界几十次的核威胁、无孔不入的恐怖主义威胁、难以控制并愈演愈烈的非法移民潮和难民潮、世界经济一体化、互联网和全球信息资源的传播及共享,所有这些每天都在向世人传达并强化着一句话: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紧紧地捆在一起,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命运都与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作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能老是注意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学要想融入世界并对全世界和全人类文明产生影响,就不能自我局限于所谓“个性化写作”、“艺术自足”等小圈子和民族文化、民族命运、民族传统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圈子,而应当继承并真正实现“兼济天下”,使我国的文学与全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苏联文学,一大批的作家都具有全球性的思维,全都关注到人类危机的问题。那时苏联的物质非常紧张,那些作家想的不是自己的问题,不是自己民族的问题,他们想的是全人类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世界级作家。他们那时候的处境要比我们现在的作家差多了,但是我们的作家看见周围的人富起来,就对自己那点工资不满意了,就写不下去了,要知道当时苏联的作协主席每次买面包要排队两个半小时。我们应当利用全球化的机遇,让中国文学更上一个台阶,包括我们的民族精神。

**王予霞:**入世后的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加入WTO是“羊入虎口”,还是“与狼共舞”,是机会无限还是危机四伏,都有赖于我们文化的调整速度与适应能力。西方文化是伴

随着强势经济而来的,自身会带着颐指气使的优越以及缺乏节制的冲击力。所以即使在西方可能是好的文化,到我们这儿也会显示对其他民族文学的一股霸气,在向其他民族推广中也会有许多负面的作用。我们的大众文化生产靠的是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从世界全球化进程看,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几乎是共时性的、同步性的。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势必会在接受全球化的同时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捍卫本土文化的尊严,维护后者的完整性。解决了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之后,真正有思想穿透性的作品就会产生。

**朱水涌:**全球化之后,中国文学有个关系的变动,经典的文学艺术跟大众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就非常清楚了。以前无论是经典或者非经典,其关系构成都是作家、作品、读者,这是过去的关系模式。以后会有很多的因素加进来,包括出版单位、中介机构、书商,还有读者市场。这就分成了两类写作,一类就是由读者决定创作的关系,读者有多少,就变成书商的目的,是他们请作家来写,这类的东西以前我们也叫它文学,现在是大众文化,特点是可以复制、可以成批量地生产;还有一类是用文学独特的方式把握这个时代,把握经济全球化到来的初生状态,这种状态是理性和哲学心理学无法把握的,但是文学把握得到。文学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事实,他们把自己意识到的东西表达出来变成作品,用作品来影响时代读者对世界的认识。

**王予霞:**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消费文学与纯文化各自承担自己对社会承诺,次文化和边缘文化进一步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